

#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 王汎森

五四運動是改變近代中國思想氣候的重大事件，可以化為無數研究課題。在思想方面，相關研究甚多，所以筆者想在文章一開始強調，本文主要是想探討五四運動還可以從哪些方面去研究。我們是不是可以試着將五四運動與整個生活世界的變化聯繫起來思考？

## 一 研究歷史及參與歷史

五四的「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成為批判、評定當前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判準。人們一方面發揚五四，一方面批判現實。正因為五四研究與現實發展之間的聯繫如此密切，它的研究史本身也成了一個饒富意味的問題。

在過去五、六十年，五四研究對台灣整體的發展有着深厚的意義。它不只是歷史研究，同時也參與塑造當代，而且兩者往往密不可分、交互作用，用佛經的話來說，即是「互緣」。事實上我們只要翻開任何一份五四研究的目錄<sup>①</sup>，就會很快地看到在1990年代(甚至更晚)以前，對台灣的報刊雜誌而言，紀念五四是一件很嚴肅的任務，五四書寫往往帶有雙義性，即一方面是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為了現實，「寫歷史本身即是歷史的一部分」。五四的「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成為批判、評定當前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重要判準。人們一方面發揚五四，一方面批判現實<sup>②</sup>。正因為五四研究與現實發展之間的聯繫如此密切，它的研究史本身也成了一個饒富意味的問題。

當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的時候，西方世界出版了大批相關書籍，其中像傅勒(François Furet)和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研究史之研究，並指出研究與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sup>③</sup>。用傅勒的話說，史家研究法國革命史，其實也在參與他們當代的歷史<sup>④</sup>。「五四」與「法國大革命」不能等同，但它們也有彷彿之處。筆者覺得傅勒和霍布斯鮑姆很注意每一個時代的「時代特質」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解釋」之間的密切對應關係。譬如當馬克思主義流行時，有關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就有一番相應的變化。

但是我們可以從這類「對應論」式的研究史中看出一點瑕疵：在「對應論」式的討論中，「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是靜止、分開並列的，而不是三者之間形成一種不間斷地、快速旋轉的、漩渦般的關係<sup>⑤</sup>。如果「過去」、「現在」、「未來」不是可以清楚切割並立，而是像漩渦一樣「不能以一瞬」（蘇軾《前赤壁賦》）的速度交纏而進，那麼「過去的五四」、「現在的書寫」、「未來的影響」這三者的關係像漩渦般交互揉纏，也就不能說成是一種簡單的「對應」關係。

## 二 兩個五四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sup>⑥</sup>。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除非是為了批判或為了「匪情研究」，否則接觸1930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份，而且兩種成份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從1917年左右開始，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白話新文學等為主軸。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左右兩翼時濃時淡，像調色盤中的色彩到處竄動、交融<sup>⑦</sup>，其成色與分量之增減，與北伐、清黨等政治局勢的變化也有非常複雜的關聯。但是愈到後來，則儼然有左右兩個五四運動。

筆者認為，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因而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當時青年常將「新學理」掛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也在「新學理」的大傘下被並置。從《五四時期的社團》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等書，可以看出同一個社團或同一個期刊，往往同時擁有在當時不覺得互相排斥、而在左右兩翼分裂之後覺得不共戴天的思想成份。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中有許多材料顯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管是閱讀的書刊，或是信從的觀點，都是左右雜存的<sup>⑧</sup>。蔣介石早期的日記與年譜，亦復顯現他在五四時期一方面服膺「輸入新學理」的主張，積極學英文、想遊學歐美三年，同時也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愛好者<sup>⑨</sup>。

以傅斯年、羅家倫兩位五四運動的主將為例，他們後來皆成為胡適陣營的人物，而且都堅決反共。可是如果以後來的發展，倒着回去看他們在五四時期的思想面貌，就會發現後來發展出的單一面相與五四時期有明顯的差距。傅斯年在《新潮》中發表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在傅斯年過世之後台灣大學所編的集子以及1980年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傅斯年全集》，這篇文章都未被收入，因此遮蓋了他在五四時期思想的複雜性。至於羅家倫，他在唸北京大

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

學時原與李大釗過從甚密，曾積極撰文響應李大釗，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全世界之主流<sup>⑩</sup>。

我們暫時不管這些全國知名的風頭人物，改看當時在地方上尚不知名的小讀者，也常見左右兩翼成份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情形。最近筆者有機會讀到《王獻唐日記》的打印本，在王獻唐1917年所讀的書中，既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及《杜威五大講演》，也有《馬克司經濟學說》、《革命哲學》，倭鏗(Rudolf Eucken)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雜在《老子》、《莊子》、《東塾讀書記》、《求闕齋日記》之類古籍中<sup>⑪</sup>。這一位不知名的山東青年的私人記錄告訴我們，在當時青年心中，我們後來以為天經地義的分別是不存在的，所以應當合「左」、「右」兩端看那個時代，才能比較清楚地把握當時的實況，也比較能有意識地觀察它們後來為何分道揚鑣。

五四是一個改變近代中國各種氣候的關鍵事件，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時，我們往往因過度注意平滑上升的軌迹而忽略了事件發展、積累到一個程度，會因各種因素的匯集而有一個「量子跳躍」的時刻。

### 三 五四幾乎無所不在的影響

前面提到五四是一個改變近代中國各種氣候的關鍵事件，所以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時，我們往往因過度注意平滑上升的軌迹而忽略了事件發展、積累到一個程度，會因各種因素的匯集而有一個「量子跳躍」(quantum leap)的時刻。「量子跳躍」造成一種大震動、一種重擊，它對日常之流造成「中斷」、「回頭」、「向前」，形成了一種新意識，在識認原有的情境與材料時，形成了新的線索。

探究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用蒙文通的意思來說，必須要能「前後左右」<sup>⑫</sup>。一方面是，在了解這個運動的形成時，不能只注意與運動內容直接相關的部分，必須從「前後左右」去尋找；另一方面是，描述這個運動的影響時，不能只局限在思想領導者所意圖要傳達的訊息，因為它的影響無微不至，常常在意想不到之處也發生了影響，故必須從「前後左右」去求索。

五四給人們帶來一種「新眼光」，老舍即回憶經過五四，有一雙「新眼睛」在影響着他的創作：「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老舍又說<sup>⑬</sup>：

「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這樣，以前我以為對的，變成了不對。……既可以否定孔聖人，那麼還有甚麼不可否定的呢？……這可真不簡單！我還是我，可是我的心靈變了，變得最敢於懷疑孔聖人了！這還了得！假若沒有這一招，不管我怎麼愛好文藝，我也不會想到跟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有所不同的題材，也不敢對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

……

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反禮教及反帝國主義]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雖然我寫的並不深刻，可是若沒有「五四」運動給了我這點基本東西，我便甚麼也寫不出了。

筆者的觀察是，五四的瓜架上不是只有「德先生」、「賽先生」這兩隻大瓜，不經意的幾篇短文或幾句話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影響，形成一種新的氣氛或態度：包括新的學術態度<sup>④</sup>、文化氛圍、人生態度、善惡美醜好壞的感覺與評價、情感的特質（譬如強大的「道德激情」）等。

五四也帶來一種新的政治視野，對於甚麼是新的、好的政治，有了新的評價標準。用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中的話說：「〔民國〕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着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變化，使得國民黨得着革命的生力軍。」<sup>⑤</sup>從清季以來有一波又一波的「紳士大換班」<sup>⑥</sup>，五四運動造成一波新的政治運動與政治菁英。

五四亦牽動到思想與現實的利益。以出版界來說，五四造成老字號與新字號的「大換班」，思想變化夾帶着現實利益的重新分配。上海商務印書館在五四之後改組，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汪原放筆下的亞東圖書館，由1913至1918年間生意清淡，到新文化運動之後因承印新書籍而大為昌盛（譬如《新青年》由起初只印一千本，到後來一個月可印一萬五、六千本）。後來當青年由新文化運動轉向革命之後，亞東圖書館承印《建設》等革命刊物，更是大收鴻利——用汪原放的話說：「不久後，〔《建設》〕多數的編譯、著者，都到廣東忙更重要的事情了」，「出頭了，我早就說過，一定要出頭的！」「革命的人都出頭了」<sup>⑦</sup>。在此氣氛下一方面響應新思潮，一方面藉機圖利的出版事業不勝枚舉，它們一面爭利，一面幫助了新思潮的擴展。

真誠的信從者（true believers）與現實的利益往往套疊在一起，不再能分彼此，「新青年」及後來的「進步青年」成為一種既帶理想又時髦的追求後，帶出了一種新的現實，成為出風頭、趕時髦的資本。同時，連出風頭、趕時髦、吸引異性、戀愛的方式都有一種微妙的變化。

五四運動激起了一種關心國事、關心「新思潮」的風氣，造成了一種閱讀革命，書報閱讀者激增，能讀新書報即代表一種新的意向；而且也深刻地影響着青年的生命及行為的形式，人們常常從新文學中引出新的人生態度及行為的方式。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閱讀史時，有學者從一宗訂閱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作的通信中發現，有的讀者因為太深入盧梭的思想世界，竟模仿起盧梭的生命歷程及行為方式來<sup>⑧</sup>。這類例子當然是常見的，晚清以來有許多人讀曾國藩的日記或家書，而在生命的安排及行為方式方面深受其影響。除了生命風格的改變之外，新青年對事事物物也有一套新的看法，譬如美化工農群眾。夏濟安就說過：「五四時代對於『下等人』有種肉麻的抬舉。」<sup>⑨</sup>對所謂「下等人」品格境界的美化，也影響到許多人的行為抉擇。

像五四這種改變歷史的重大運動，它搖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塊石頭都翻動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來的地方，往往也是經過一番思考後再放回去。而且從此之後，古今乃至未來事件的評價、建構方式，每每都要跟着改變。譬如以五四作為新的座標點，古往今來的文學、藝術、政治、歷史等，都要因它們與五四的新關係而經過一些微妙的變化<sup>⑩</sup>。即使連反對派也不能完全豁免。許多反對派隱隱然接受某些新文化運動的前提，或是為了與它對抗而調動思想資源，形成某些如非經過這一對陣，是不可能以這個方式形成、或如此展現的討論形式，或是根本在新文化運動論述的籠罩之下而不自知。

五四激起了一種關心國事、「新思潮」的風氣，造成了一種閱讀革命，書報閱讀者激增，能讀新書報即代表一種新的意向；而且也深刻地影響着青年的生命及行為的形式，人們常常從新文學中引出新的人生態度及行為的方式。

這不是一種單純的「影響」，應該說是新文化運動當空「掠過」而使得一切分子的組成方式發生變化。此處可舉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進化論與近代中國思想界的例子。這一學說影響許許多人，可是起而與之對抗的學說 (譬如宋恕等人的以弱者為主體的「扶弱哲學」)，顯然是針對「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強權公理」的一種反擊；但反擊在另一種方面說是潛在的「反模仿」，如果不是因為有「天演論」，則不至於有像宋恕那樣動員各種思想資源來構作以歷史上的弱者為中心的哲學。至於章太炎提出「俱分進化論」，主張「善進惡亦進」、太虛大師用佛經來評「天演論」等等，也都不是「天演論」之前會出現的表述。

#### 四 「新青年」與「進步青年」

事實上，從晚清以來「青年」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清末是「革命青年」，五四時期是「新青年」，後來則是「進步青年」。「新青年」關心的事與「進步青年」有所不同，前者關心獨立自主、個人主義；後者倡導社會主義、社會革命<sup>②</sup>。

五四造成一代青年群體的生命特質，「新青年」要做的事，是提倡新文學、白話文、新劇，喜歡講哲學、文學、藝術，關心人生、家庭、戀愛、高深學理、人道主義、留學、理想，關心「人」的問題，主張「人」的解放。此外，他們也探究新宗教、新教育、新生活。

在生活態度上，他們則重視作為「國民」的身份，由不看報改成看報，由不關心國家大事改為關心國家大事，痛恨政治上武人升降及政客之起伏。「新青年」認為如果當時中國沒有在教育文化方面造成一種全新的空氣，說不定會再有第二回、第三回恢復帝制的把戲。

「新青年」認為一切希望皆在教育，對當前的政治則非常冷淡，有「非政治化」的傾向。在教育方面，他們受到杜威 (John Dewey) 的影響而主張生活與教育合一，理想的學校裏應該有圖書館、療病院、商店、報館、工場、農場，學校簡直是現實世界的雛型。

「新青年」因為五四的震動，而有一種精神上的「驚醒」，深入省察自己，有一種批判自己、革新自己的精神在心中流蕩，寫文章也好用「覺悟」一詞。「新青年」要廢除一切束縛，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對於學術思想、風俗習慣、政治制度，都想重加檢驗後才決定是否接受。

「新青年」好辦書報，讀刊物、辦刊物猶如雨後春草般萌生，而且刊物大多有個「新」字。西洋學術思想成為一時的嗜尚，出洋留學成為一時時髦。西洋文學也逐漸風行，購求原本或英文譯本成為風氣。

在學術上，「新青年」認為學術只有世界的學術，絕對沒有國別的區分；只有化學，沒有中國的化學。如果稱為「中國學」，就表示那是一大堆尚未加以整理的學術材料，尚未歸入「天文學」、「人類學」等世界的學術裏頭去的意思。

以上所說的一切，叫做「新思潮」。因為「新思潮」的發動區往往是在都市，所以青年成群地向都市裏跑，希望能親身參與。北京、成都、長沙、上海、廣州等城市尤為活躍，「他們覺得他們的生命特別有意義，因為這樣認識了自己的

像五四這種改變歷史的重大運動，它搖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塊石頭都翻動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來的地方，往往也是經過一番思考後再放回去。而且從此之後，古今乃至未來事件的評價、建構方式，每每都要跟着改變。

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歷史上不曾有過。」上面引的這幾句話，以及前面有關新青年生命特質的描述，都取材自五四青年葉紹鈞（葉聖陶）的小說《倪煥之》<sup>22</sup>。它雖然是一部小說，但一般認為它很能傳達五四青年的形象。

漸漸地，由「新青年」轉向「進步青年」，從關心個人的生活與解放，慢慢轉向關心整個社會的解放。「進步青年」認為「為教育而教育」、「為人生而人生」之類的主張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大談「工人」、「貧困」、「勞動神聖」、「主義」、「同志」、「階級」、「社會」，並質疑「國家」。由「新青年」變為眼光完全向前凝視着一個理想社會的「進步青年」後，青年由原先指導、教誨人民者變成努力想成為工、農中之一份子。此處讓筆者再引《倪煥之》中的句子為例。《倪煥之》的敘述愈到後來，「社會」的成份愈強：「單看見一個學校、一批學生不濟事，還得睜着眼睛看社會大眾」<sup>23</sup>，「學校同社會脫不了干係，學校應該抱一種大願，要同化社會」<sup>24</sup>。小說並藉着傾向社會革命的王樂山之口，質疑倪煥之做的事：「社會是個有組織的東西，……要轉移社會、要改造社會，非得有組織地幹不可！」<sup>25</sup>此後，「組織說」開始閃在心頭，他們讀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認為「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無意義的言語，目前的教育應該從革命出發」<sup>26</sup>，否則一切徒勞，「同時意想着正要去會見那些青布短服的朋友，只覺得他們非常偉大」<sup>27</sup>。然後是革命，入黨參加革命成為新的社會菁英，而成為這一新菁英不需通過科考、不需學歷——「革命不是幾個人專利的，誰有熱心，誰就可以革命！」<sup>28</sup>同時，新文化運動領袖的魅力也在逐步減退中，那也正是胡適在北大的課堂由最大的禮堂一步一步變到較小教室的時候<sup>29</sup>。

在學術上，「新青年」認為學術只有世界的學術，絕對沒有國別的分；只有化學，沒有中國的化學。如果稱為「中國學」，就表示那是一大堆尚未加以整理的學術材料，尚未歸入「天文學」、「人類學」等世界的學術裏頭去。

## 五 新名詞與新概念、文學與思想

在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樣的運動中，真正可能對一般人產生影響的，不一定是長篇大論，而更多是改寫的、刪選的小冊子、幾張傳單，還有幾句朗朗上口的的新名詞或新口號。從晚清以來，大軍壓境般的新名詞所構建而成的「群聚」（clusters），為市井百姓帶來了思想資源。劉師培1906年〈記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這樣說「新名詞」在道德倫理方面產生轉轍器般的作用<sup>30</sup>：

當數年以前，人民雖無新智識，然是非善惡，尚有公評。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由是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

這一類材料非常多，茲不俱引。筆者想說明的是，從晚清到五四再到共產革命，有一批又一批非常強大有力的新名詞、新概念所形成的「群聚」，構成一張又一張新的詞彙地圖，它們與一種清楚的目的論意識相隨，形成一種「態度與指涉的結構」<sup>31</sup>。這些新的概念、詞彙，形成一種高度目的論意義的境界，創造一種「向上」的軌轍，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嚮往意識，並且帶來一套「激發視

從晚清到五四再到共產革命，有一批又一批非常強大有力的新名詞、新概念所形成的「群聚」，構成一張又一張新的詞彙地圖，它們與一種清楚的目的論意識相隨，形成一種「態度與指涉的結構」。

野、塑造實踐」的性情<sup>②</sup>，讓人們覺得理想上應該盡力向它趨近，因而成為一種有力的思想滲透及改變行為的力量。

譬如在民國時期的小說《新廣陵潮》中，不斷出現「文明禮數」、「西洋慣例」、「輕蔑女界」、「有志青年」<sup>③</sup>，沒有受新教育者「人權便不能完備」、「未得些光明」<sup>④</sup>等等字眼，似乎隨着新的思想資源的介入，當時的世界已經構成一種清楚的劃分：一方面是尚未起步的，一方面是值得向上追求的價值與行為。《新廣陵潮》所描寫的時代，顯然是晚清以來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左右。隨着時代推進，前面所舉的那種由新詞彙、新概念所構成的目的論式世界的內容不斷改變。

筆者認為在解讀五四時期重要思想文獻時，我們每每費心重建作者意圖而忽略了「文字的影響，每發生在作者所不及料之處」<sup>⑤</sup>。而且不只是思想文獻，當時的小說、詩歌、散文等，也表達了許多新概念或形成了新的感情結構，人們就在這張新網絡之下吸收、編織他們的思想及意義，而且這張新的思潮網絡也成為公眾構思評判事物的新標準。

新文學作品有深刻的思想史意義，五四新文學中所傳達的社會思想及批判意識，對於現實的影響絕不輸於一些里程碑式的思想文獻。當時青年往往同時受文學及思想文獻的影響，往往因為新文學而決定思想上的動向，或是以文學中所建構的社會理想作為思想及政治追求的目標。而文學中的不滿與譴責，也往往轉化為他們思想上的批判與反抗。艾略特(Thomas S. Eliot)在討論英國十七世紀的「形而上詩人」時提到他們善於將思想轉化為情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將思想轉化為情感的過程中，必須要先構思一個兩者之間的「等價物」，以便利於它們的轉換<sup>⑥</sup>。思想與文學中情感世界的轉換確實是很明顯的。五四時期文學中的社會思想，對「未來」的想像與建構等無數方面，對現實都極富影響力。

## 六 街頭層次的五四運動

目前為止，學界對五四的研究仍然較集中在舉國聞名的人物，對那一群北大老師、明星學生及各省響應的知識青年的了解很充分，但是對地方或草根層次的五四研究卻相當之少<sup>⑦</sup>。筆者使用「街頭層次」一詞，當然是受到當代法國大革命史家達頓(Robert Darnton)的一本小冊子的影響。這本小冊子由兩篇文章組成，第一篇的標題即是〈街頭層次的法國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at Street Level”) <sup>⑧</sup>——雖然那篇文章所討論的還不是真正的「街頭」層次。

不過我們的思維不應囿於不是「上」就是「下」，不是「菁英」就是「草根」，而是應當注意當時各個層次都可能受到五四的影響，而且因為影響、改換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悄悄進行，所以未必能夠引起足夠的注意。

這裏要舉五四前後上海戲劇界的一個個案為例。1918年，上海「新舞台」首演《濟公活佛》一劇時，以舊道德的捍衛者自居，對歐風東漸大加抨擊。李孝悌的研究說明了經過《新青年》的「戲劇改良號」中對傳統戲曲的猛烈攻擊、新思潮的洗禮、《娜拉》(A Doll's House)之類新劇的影響，到了1920年，「新舞台」的告白全變了<sup>⑨</sup>：

排這一本社會最歡迎的《濟公活佛》，並不是迎合社會心理，老實說是拿遷就社會的手段去征服社會。換一句話說，就是利用濟公活佛，拿極淺近的新思想去改革社會上的「惡習慣」和「舊思想」。……十五本活佛，是我們征服社會的戰利品。他的情節發鬆到極點，布景精緻到極點，令人百觀不厭。他的思想，竟和近代的新文化吻合。……十五本活佛，第一是勸人要勞動，不可倚賴親族不勞而食。第二勸人要為社會服務，不要為社會分利的官吏。第三排斥多妻主義。第四勸人不可自殺。

1920年3月1日刊登在《申報》上的《濟公活佛》一劇之廣告，還極力宣稱它是一齣「問題戲」，廣告一開頭先用加大字體寫出全劇主旨：「今夜活佛是『問題戲』」，然後有如下的說明<sup>40</sup>：

西洋戲中有一種叫做「問題戲」，戲中演的情節，有關於政治的，或社會的，或家庭的，或……的。故意演出疑難的情節，要徵求看戲人的意見，要請看客心中感覺戲中的事迹，是否正當？

「問題戲」的觀念完全是從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來的<sup>41</sup>。至於該劇中模仿《娜拉》的部分，幾乎完全是易卜生 (Hendrik Ibsen) 的框架<sup>42</sup>。

上述是五四對當時上海市民最喜歡光顧的劇院的影響，其變化之微妙與迅速，非常值得注意。這一類的例子可能發生在街頭，也可能發生在小教室。五四之後，山東省立一師國文論理教員兼附屬小學主任王祝晨首先積極響應，與正誼中學校長等組織尚學會，先將各地新刊物中的文章，選取其菁萃，分為文學、教育、哲學、倫理、社會五種印成書，名為《文化新介紹》；同時連絡已成全國知名人物的傅斯年等邀請杜威前往濟南演講，因而引起當地守舊派的激烈鬥爭。《文化新介紹》風行各地，讀眾極廣，後來轉交上海文化書店出版，王祝晨更成為山東省立一師的校長。可是到了1926年，山東督軍張宗昌以「提倡白話文即是赤化」，封閉書報介紹社，撤去王祝晨的校長職位並加以通緝<sup>43</sup>。

事實上像這一類地方上的事例在當時簡直不勝枚舉，如果加以搜集這方面的材料，我們可以觀察在地的小知識份子或在地讀書人，如何感知、回應這個舉國震撼的運動，如何迎接或推拒，如何賦予在地的詮釋，新思想如何影響在地的生活方式，以及這一個全國震撼的運動如何造成各種動員，與舊派人士如何競爭，與抱持其他意態的人如何互相競合，在思想、家庭或行動方式方面有何變化，以及如何因此而形成群體的劃分等。在廢科舉之後，地方青年如何因着反對，或是響應、模仿、號召、動員，而與外面的新力量聯合，形成新標準或新力量，並把自己塑造成為新的地方菁英等。

前面筆者曾引用鄭超麟的「紳士大換班」一語來形容晚清以來對地方社群菁英群體間的大洗牌。在後科舉時代，當科名已不再是那麼絕對的社會菁英的識認標準，新學校系統的學歷承擔起部分傳訊機制 (signalling system) 時，到處都有吃五四飯的「新青年」，成為地方社會或國家的新棟樑，成為人們羨慕追求的對象。在《倪煥之》、《子夜》這一類小說中，我們更可以看出在國民革命軍北伐

在後科舉時代，當科名已不再是那麼絕對的社會菁英的識認標準，新學校系統的學歷承擔起部分傳訊機制時，到處都有吃五四飯的「新青年」，成為地方社會或國家的新棟樑，成為人們羨慕追求的對象。

把五四與近代生活世界的變化進行聯繫，在這個方面，可以探討的面相一定還非常之多。記憶五四、研究五四，始終是一個值得被研究的問題，現在如此，將來恐怕也是如此。

之後有一段時間，入黨與否成為能否取代鄉紳成為新菁英的憑藉。在《倪煥之》中，自幼不學好的蔣華在父親心目中本來毫無地位，但是因為在北伐期間入了黨，成為可以與外面正在沸騰發展的大局勢相連絡、又能在地方上調動各種資源的人物。他那惡名昭彰的父親蔣老虎便懇切希望兒子能介紹他入黨。入黨不需甚麼資格，連地方名聲都不用，最後蔣老虎順順利利入了黨，成為地方上的新菁英。

當然，我們還要發掘各階層的思想材料。在研讀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史時，筆者注意到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sup>④</sup>中所提到的一件頗為引人注意的事件。1968年，色川大吉在明治時期的武藏國多摩郡、一個只有二十幾戶人家的深沢村裏，從一戶人家的倉庫中<sup>⑤</sup>，發現了〈五日市憲法草案〉。這個草案有204條，是五日市學藝講談會的三十名會員在自由民權運動期間持續討論，再由山村中小學的助教員千葉卓三郎起草的一部草根憲法，時間大約是明治十四至十五年（1881-1882）。這個山村中的小圈子是以深沢名生及其子深沢權八為中心，在他們周圍的是一群村中名士、校長、神官、僧侶、醫生、地主、農村青年。色川大吉發表這個消息之後，發現事實上當時還存在三十餘種民間的憲法草案，其中嚶鳴社的草案比〈五日市憲法草案〉的條文還多四倍。而且這一類文稿相當多樣，譬如千葉卓三郎對布魯厄姆（Henry P. Brougham）《法律格言》（*Institutional Maxims*）的詮釋，與元老院對《法律格言》的翻譯便截然不同，茲引一例<sup>⑥</sup>：

元老院譯文：國君的精神應當可假定為符合法律的精神及理所當然的事理，如有疑問時，特別是可作如此疑問時，其假定（presumption）常要有利於國君。

千葉卓三郎譯文：全體國民的精神應當可假定為符合法律的精神及理所當然的事理，如有疑問時，特別是可作如此疑問時，其假定常要有利於國民。

我們在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這類掀天揭地的大事件時，應該注意挖掘像〈五日市憲法草案〉這一類在地知識份子所形成的文本，並充分了解其思想意義。

## 七 結語

最後，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青年運動，但是當時年紀較大的人的作為與反應，也值得留意<sup>⑦</sup>。這包括廣大人士的觀感與反應，尤其是那些年紀較長者的確切反應。此處僅舉一例：山西太原的一位前清舉人劉大鵬留下了一部相當詳細的日記，在五四這幾天，他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件事，幾天之後他才對此有所記錄。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政治與文化兩面，則他先只注意到這個運動的政治面，也就是抗議帝國主義的愛國示威運動<sup>⑧</sup>，但劉大鵬對新文化運動的部分似乎一直到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有較為清楚的了解。相較之下，當時在上海目睹罷市的王國維則有如下反應：「而不知以後利用此舉者當接踵而起，則大亂

將隨之矣。有人自北來，言北京政象極險，……如危險思想傳入軍隊，則全國已矣。」<sup>⑨</sup>像王國維這樣的議論在當時並不罕見，它提醒我們應當深入分析當時對五四「半信半疑」或反五四的思想，細緻地了解其中的底蘊。

在本文中，筆者提議把五四與近代生活世界的變化進行聯繫，在這個方面，可以探討的面相一定還非常之多。最後，筆者想重申本文一開頭說到的：記憶五四、研究五四，始終是一個值得被研究的問題，現在如此，將來恐怕也是如此。

### 註釋

- ① 例如2009年3月出版、由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編的《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
- ② 在台灣，一直到政治解嚴及政黨輪替，「民主」與「科學」似乎不再那麼迫切之後，紀念五四或發揚五四才逐漸不再成為必要的活動。
- ③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ric J. Hobsbawm, *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 Two Centuries Look B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④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 原文是“written history is itself located in history, indeed is history, ...”。
- ⑤ 關於這一點，可能受到已故京都大學哲學家田邊元的影響，但是一時找不到出處。
- ⑥ 資料性的纂輯比較例外。如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9)；張允侯等：《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三聯書店，1979)。
- ⑦ 參見傅斯年：〈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28-29。
- 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535-44；「問題與主義論戰」期間，毛澤東一度還是胡適「問題」派的信徒，頁396-403。
- 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萬仁元、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38-39。
- ⑩ Maurice J.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3), 71.
- ⑪ 丁原基整理：《王獻唐日記》，打印本，頁1-29。
- ⑫ 羅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鄰：蒙文通先生與思想史的社會視角〉，載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240-70。
- ⑬ 徐德明編：《老舍自述》(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25。
- ⑭ 譬如有「新」意識的人，對古代經書可能採取批判的態度，不會再把先秦禮經當作周代生活的實際記錄。
- ⑮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二十一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436-50。
- ⑯ 鄭超麟著，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115、150。
- ⑰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頁20、33、34、45。
- ⑱ 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215-56.

- ①⑨ 夏志清輯錄：〈夏濟安對中國俗文學的看法〉，載《夏志清文學評論經典：愛情·社會·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頁242。
- ②⑩ 又如「傳統」，如果它是像艾略特(Thomas S. Eliot)所說的那樣，是「由既存的紀念物所構成的一種理想的秩序」，那麼經過五四的震蕩，既存紀念物便重構成另一種理想的秩序。艾略特著，杜國清譯：《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台北：田園出版社，1969)，頁448。
- ③⑪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5)，頁92；127。
- ④⑫⑬⑭⑮⑯⑰⑱ 葉聖陶：《倪煥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34-35、71、65、174-87、190、191；181；182；199；207；214；238。
- ⑲ 鄧廣銘的原文是：「從他到北大任教，直到20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禮堂上課，30年代就改在稍小點的二院禮堂上課，而到抗戰前夕，則改在更小的紅樓大教室上課……。」鄧廣銘：〈我與胡適〉，載《鄧廣銘全集》，第十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頁300。
- ⑳ 此文原載《申報》，1906年12月13日，收入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頁457。
- ㉑ 「若干符碼、意象、辭彙、信念、以及這一切所構成的文化價值，無不屬於這些『態度與指涉的結構』，這些結構形成某一時代的精神意向或意識形態環境。」參見李有成：《在理論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246。
- ㉒ 參見李有成：《在理論的年代》，頁246。
- ㉓⑳ 李涵秋、程瞻廬：《新廣陵潮》，上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第九回，頁9；10-11。
- ㉔ 以上兩點，前者見於Thomas S. Eliot, "The Metaphysical Poets"，後者見於"Hamlet", in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32), 246, 248; 125。
- ㉕ 大地方的五四，在過去已有陳曾熹撰，陳勤譯：《五四運動在上海》(台北：經世書局，1981)的專書等。
- ㉖ Robert Darnton, "Lecture I: The French Revolution at Street Level", in *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 ㉗ 《申報》，1920年9月27日。轉引自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1880s-1930s)〉，載劉翠溶、石守謙主編：《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361-409。
- ㉘ 《申報》，1920年3月1日。轉引自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傳統與現代(1880s-1930s)〉，頁395。
- ㉙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胡適文存》，第一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頁71。
- ㉚ 參見「新舞台」的宣傳文字，《申報》，1920年6月30日。
- ㉛ 鄧廣銘：〈王世棟(祝晨)先生服務教育三十五周年事略〉，載《鄧廣銘全集》，第十卷，頁404。
- ㉜ 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東京：岩波書店，1976)。
- ㉝ 現屬東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
- ㉞ 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頁19-51、79-128。
- ㉟ 如前面提到日本〈五日市憲法草案〉的例子，其成員多半是三十至四十歲。
- ㊱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278-80。
- ㊲ 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78。